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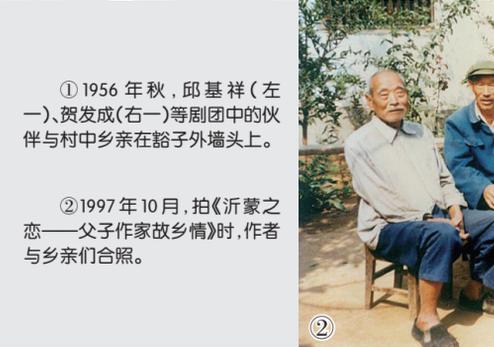
讲述

忆战时农村剧团

口苗得雨



① 1956年秋,邱基祥(左一)、贺发成(右一)等剧团中的伙伴与村中乡亲在豁子外墙头上。



② 1997年10月,拍《沂蒙之恋——父子作家故乡情》时,作者与乡亲们合照。

说起来,都是六七十年的事情了,可还是那么难忘,从中见得艺术之长久性。那年,拍专题片《沂蒙之恋——父子作家故乡情》,约谈的差不多都是当年剧团的伙伴,所谈的也是当年搞剧团的一些事情。

当时在山东,这一工作开展得最活跃的是鲁中、胶东和滨海,其次是渤海。鲁中有一个沂南县,滨海有一个莒南县,又是最活跃的两个县。莒南有“庄秧秧歌队,村村锣鼓声”之评语。有名的剧本《过关》,取材于这个县的沈家扁山村的实事;莒南东良店剧团根据当地的故事自编的《互助组》,传遍山东各地;沂南南沿汶剧团创作的《邹大姐翻身》,影响也很大。当时莒南有剧团140多个,沂南有剧团110多个。秧歌队几乎村村都有。山东省文协于1940年成立后,就提倡农村剧团,但作为解放区人民文化运动的一项工作,还是在1943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。

事情的开始是意想不到的。那时,我们这些生活在闭塞山乡的“庄户土”,只知道世上有“大戏”,歌谣中说的“姥娘家门前唱大戏”,即那时说的“国剧”,现在说的“京剧”。我还听过“周姑子”之类的地方小戏。不知道世上还有话剧、歌剧、歌舞剧和各种曲艺、舞蹈。见过讨饭的唱“莲花落”,谁想那就是曲艺的一种。当地农村在一年之中,只在春节即从初一到十五有办“嘎馆”(即杂耍),踩高跷、跑旱船、抬“赃官”、推“皇朝”,锣鼓喧天,热闹得人人心花怒放。

我去永胜官庄走亲戚,见那里的小学生在排练连说带唱的《亲家母顶嘴》,唱的调子都是很好学的小调,人们把这种剧叫小调剧。里边有一段赶驴:“我老娘骑上了那小毛驴来!去到那亲家母家走一遭呀……”边唱边舞。

1944年春,在一次军民联欢会上,我们看了鲁中宣传大队的演出,大开眼界。这一次演的,既有那种有说有唱的《抗属真光荣》(中间有一段打花棍,完全是舞蹈),也有全是说话的《双喜临门》(当时叫报道剧),还有根据传统的《编大缸》形式改编的《打沙锅》,还有一个小舞剧《双送子》,以及蹦蹦跳跳的《青年舞》(舞蹈)。幕间一个人戴着礼帽,穿着大褂掖起一个角,打着竹板说“武老二”(夜摸上店)和《计取袁家城子》,还有男女声二部轮唱。那真是丰富多彩,比看一晚上“大戏”还要过瘾哩!

许多宏伟的事业,最早开始于简单的模仿。当我们在南墩“四·四”儿童节晚上看界湖镇青年剧团演出了丰富多彩的节目之后,就学着演起“新戏”来。不久,在一次村民会上,借来小商贩家的两块篷布前后一挡,家乡的第一次“新戏”演出了。里边的老头、老妈妈、大姑娘、小媳妇、大壮汉、小伙子,全都是我们十二三岁的孩子扮演的。这一次开天辟地的新戏演出,有《亲家母顶嘴》《咱们帮助你》《打沙锅》和《快乐舞》。我在《亲家母顶嘴》中演一个老妈妈,在《咱们帮助你》中又演一个小姑娘。

以后每次开村民会,剧团都会演出。只要哪一天晚上有人敲着锣满街喊:“开村民会啰!”就知道今晚准演戏。孩子们早早地吃完饭,抱着板凳,挨着前台坐下,然后大人们陆续到场。凡有演出的村民会,都是黑压压一大片,村干部们讲起话来格外带劲。当锣鼓“打通”后,台前悬挂的汽灯呜呜响着,乐曲悠扬地奏着,歌声,对话声阵阵,整个乡村陶醉在无尽欢乐之中。

一个剧团要有编、导、演,要有乐队和舞美人员,一个二三百户的村庄能集中起这么些人才能吗?能的。而且还有余,年年都有大批热心的自荐者挤在门外,等候补充,人才齐全,水平也不低,许多人很有一手。当然,真正地讲水平,也还是谈不到的,只是由乡亲们组成的观众不嫌吧!

人才的来源,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:首先,以我们这些年龄大一点的小学生们作为骨干。我们都是上过几年私塾,接着转到“抗日小学”来。然后,是历年春节办杂耍的积极分子加入进来。再是,一些平日好“玩”(爱好文艺)的人;地主家有的文化的开明子弟和小学教师们。还有一些是从来没沾文艺边,由政治上走向进步,也突然迷上文艺的人。

农村剧团的分工并不细,都是一个人干好几件事。忙起来,大家一起忙。演老妈妈的也演老头,演壮汉的也演小媳妇;导演也演戏,乐队人员也上场。舞台工作人员,除乐队比较固定以外,布景、化妆、打锣鼓、提词、拉幕……常常是谁摸着谁干。

舞蹈队里是七八个和我年龄相仿、但个头比我矮的小学同学。他们个头差不多,动作敏捷、整齐。第一个舞蹈是自编的“拍手舞”;第二个舞蹈《快乐舞》演出了名,有一次去大集镇界湖演出,获得了热烈掌声,界湖剧团的一个负责人连连叫好:“好不好啊,妙不妙啊,狗撵鸭子呱呱叫啊……”

舞蹈队一个和我同岁的少年叫邱为铎,多才多艺,十分聪明,他除了参加舞蹈,还担当着许多剧目中的少年儿童角色,如《亲家母顶嘴》中的傻小子、《抗属真光荣》中的孙子、《送郎参军》中的小二喜,有的活泼,有的伶俐可爱……演傻小子时,天门盖上的小撮毛编成一个朝天锥,一出场,那憨厚、顽皮的唱段就吸引了观众:“火红的太阳下了山,小小牛犊吃个饱,傻小子俺肚子饿了!肚子饿了回家转,叫声娘啊快呀开饭,傻小子俺要吃白面,唉哟,唉哟哟,傻小子俺要吃白面……”《抗属真光荣》第二幕,唱“订计划”,演孙子的邱为铎和演爷爷的邱琴亭一唱一和,配搭得十分好。《送郎参军》中,我扮演大喜(小二喜哥哥)的未婚妻小香妮,小香妮未见过大喜。二喜的模样与大喜相似,他为了试探嫂子的思想是否进步,先查她有无路条,又问她是否识字,接着冒充起哥哥,假装不愿参军,嫂嫂打通他的思想,让他等着,打垮了敌人再结婚,他说“等不了呢!”这个小戏,



演了几个村庄,都受到欢迎。过了一年,部队驻防的同志们非要我们再演一次不可,我们好歹又演了一场,部队同志们以热烈的掌声鼓励我们。演小香妮那年,我13岁,个头和妇救会长高荣菊差不多,干脆我穿上她的鞋上场。事后邻村有人向我叔叔苗田打听:“这是谁家的闺女?”苗田说:“怎么?你给他找个婆家?那是我一个侄子!”

尤其精彩的两出戏是《双喜临门》和《谁养活了谁》,角色安排恰巧、适当,一连多次演出,都受到称赞,善演反派角色的邱基祥,在《谁养活了谁》中当的是地主狗腿子,在《双喜临门》中又演了热情诚实的货郎;《谁养活了谁》中当佃户老头的是满脸胡须、十分老相的满士超老师;佃户王继忠,就是真佃户贺发成;当地地主的老爷,恰是地主家的一个子弟,那模样、风度,不用怎么表演就十分像。这时的农村,刚进行了减租减息,民族斗争是主要的,所以,地主家某些有文化的开明子弟,还是剧团人才库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1945年春,我们演秧歌剧《参加主力好反攻》,其中演地主刘二赖的是一个地主子弟,演出时穿的是他爷爷的黑单袍,一出场很像他爷爷。刘二赖因破坏参军,受到批判,显得凶恶恶狠。这个演员的精彩表演,无疑等于在台上暴露老子,演出回家,被他爷爷打了几鞋底,并再也不许他进剧团。

在乐队中,有一个“老青年”叫武继岳,在农村算老“音乐家”了,吹一口好笛子,拉一手好胡琴,他懂一点工尺谱,但许多曲子都是听来的,只知道“冷更里格冷更”,向别人传授的也是“冷更里格冷更”。他是乐队的主将兼指挥,还是“孩子头”,因他年老而不显老,性情温和,谈吐风趣,剧团当中不管怎样调皮的孩子,他都能笼络住。乐队的另一个主将是邱奎亭,也是好脾气,夜里散剧团,胆小不敢回家的孩子,愿让他作伴。他由于诚实敦厚的特点,兼演一些壮汉角色。我有时在乐队中“滥竽充数”。锣鼓班子,除了上面两位,都是随时有人凑付。

有时化妆师或景还没张就,就插上几段器乐曲。这就拉出一位老伯伯——老中医张仁轩,一位老业余音乐爱好者,笛子、月琴、胡琴无所不通,他会的一些曲子,也传授给大家。演出伴奏,一般由武继岳、邱奎亭两位担当。那些年演的一些有曲调的剧,如小调剧、秧歌剧等,曲谱多是改编利用民间流行小调。

剧本主要是由我到处搜罗。上有邻村抄的,有上书店买的,还有一些是从专业艺术团体那里借来的。那时见的剧本,有省文协出的《戏剧》《戏剧杂要集》和一些单行本,还有胶东、滨海、华中等地和部队出的剧本,以及报刊上发的剧本。每见到一个好剧本,都像拿着宝贝似的,怕损坏了,怕丢了,环境恶化时丢了几个好剧本,像丢了亲人的心,疼了好多年。

锣鼓幕布是开荒种地增加收入买的。汽灯,是庆祝减租减息胜利时,一位老佃户苗升林捐献的。化妆与布景的技巧,是跟界湖青年剧团与鲁中宣传大队学的。农村剧团没有成套的服装,每次演出都是临时去户里借。每演一次戏,像过一次小年。扎台子、挂幕布、借衣服、化妆、演出、收拾台子,从天傍黑忙到半夜,但都由于愉快而忘记了劳累。

剧团在发展中不断提高,与专业人员的辅导有直接的关系。刚成立时,村上有一位复员军人苗得清,教舞蹈,教化妆,看样子是在部队上沾过文艺边的,这是我们剧团第一个业务指导人员。这人大长得高大、粗壮,平日很少说话,若没有剧团,谁也想不到他是个文艺人才。

鲁中宣大的杨星华和界湖剧团的张盛福、马学成、孙德裕、陈友太等,对我们剧团的个人作过辅导,大家间接地学点技艺。杨星华对外号称“黑二子”,他也是沂南县的,是宣大“武老二”这一节目的作者和表演者。他的“武老二”《夜摸上店》和《大战岱崮山》《计取袁家城子》《二曹大闹蒙阴城》等,写得十分出色。张盛福说快书是跟他学的,我们又跟张盛福学的,但我们几个人(邱琴亭、邱基祥和我)都说过快书,没有一人取得成功。我有一次说《计取袁家城子》,忘了词,乱编起来,幕后的听众不对劲,隔着幕布,几只大手把我拽了进去。“弄的什么!”人们一起熊我,从那时起我被剥夺了演这一角色的权力。

1945年春,鲁中文艺辅导队进驻我们村,对我们进行了全面辅导。辅导队人才齐全,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,每一种技法都很讲究。有的教扭秧歌的各种步伐;有的指导各种人物的表演法;有的教化妆;有的教识谱。有一次,我看见邱为铎坐在学校门口,用手一点一点地敲打着歌本,我问:“这是干什么?”他说:“简谱。”我说:“谱就这样简吗?”我从他身后观察他怎么“简”法。辅导队一位同志见我对我识谱有兴趣,就专门指导,给了

我一本带识谱法的歌本(徐刚同志所编)。

1945年夏,军政干部学校驻防时,有一位龙涛同志,是懂话剧的,一直热心辅导了我们几个月。这位同志个头矮矮的,十分健谈,时常讲到深夜。他是部队一位比较负责的干部,业余爱好美术,对戏剧,可以说是业余中的“业余”,他是利用业余时间辅导我们。他蹲在边幕处督察,见谁有错,就大骂。

这年冬天,我们在县里参加文艺集训时,跟新安旅行团的几个同志学了不少东西,其中有教歌的女同志叫李群,长得瘦瘦的,年轻、聪明,一边教歌,一边给我们讲道理,后来常见到有叫李群的,不知哪一位是我们当年认识的那一位。

我参加工作出来以后,在文艺界已有多年,一直在注意那些熟悉的面孔,但不知为什么,始终未见过一位。也可能已经走远了,也可能变了模样认不得了,也可能有的已为革命献出了生命,永远成了记忆中的人。

杨星华,我知道已在上世纪50年代逝世于不幸的事故;界湖的那几个,马学成、孙德裕两位已多年在外省任地、县领导干部,陈友太仍在家乡文化机关;宣大当时主要演姑娘的角色李颖,是辛葭舟先生的女儿,后来在大连工作,她丈夫就是任过鲁中青联主任的宋诚德同志。当时她在《抗属真光荣》中演小姑娘,在《双喜临门》中演王二姐,在山东解放区的中心沂蒙山一带,远近闻名。

三

1944年和1945年为配合动员参军,《抗属真光荣》《双喜临门》等戏多次演出。大反攻前的那次参军热潮,有这几个戏的功劳。有的人就在戏台上踉踉跄跄,报名参军,并当众表决心:“打不走鬼子不回家!”《双喜临门》中有一个卖糖球的,是剧中原没有的人物,是半途蹦出来的人,他见参军的青年披红戴花,十分眼馋,为了上前线打鬼子,糖球不卖了,也报名参了军。演这个角色的潘效成,不久真的参了军。

《谁养活了谁》的出色演出,对减租减息与反奸诉苦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。那位老佃户给剧团买汽灯,就是看了这个戏受到感动和教育之后的壮举。那晚戏刚演完,老佃户跑到台后,连连称赞戏好,自报奋勇用双槌果实买一个汽灯给剧团。这个戏到新解放的沂东县苗家曲、庙岭等村去演出,那里的人们第一次看穷人说话的话,许多人都感动得哭了。有一次戏演到狗腿子在恶霸主子面前诬蔑佃户王继忠:“王继忠,骂连声,骂出口来真难听,一骂大爷剥皮鬼,二骂大爷糊涂虫,三骂大爷狗强盗,四骂大爷活畜牲,骂得我头上冒火三尺高,两个眼睛直发红,有心拉他去讲理,他一脚踢我个倒栽葱,大爷啊,我死了心里也不紧不净啊……”几个壮汉气愤之极,呼地站起来喊:“打倒财主狗腿子!”把我的老同学邱基祥吓出一身冷汗。

1944年,在一一五师部队驻地留田举行的一次军民庆功大会上,我们村的两位姑娘表演精彩的花棍舞,使庆祝活动达到了欢腾的高潮。“一根呀那个花棍呀一条心,王大嫂送郎去参军哪,王大哥参加了主力呀哪,王大嫂,在家中,纺线织布苦用工,嗯啊啾啾啾……”动人的歌声,衬着花棍哗啦啦的响声,唱出全场军民的共同心声。

战时文艺反映生活的速度很快,一些有名的战役发生不久,各种文艺节目就传来了。1944年春、夏,话剧《袁家城子》、快书《计取袁家城子》在演出时,鲁中四团正驻防于我们村,我们家住着侦连连连部,有一位眼睛受过伤的同志,是指导员,态度和蔼,常给我讲一些故事听。他给我详细讲了那次战斗情况,来我家住的同志就是那次战斗的参加者。

临沂解放时,鲁中与滨海抽了十几个农村剧团去前线慰问。我们接到通知后,忙忙碌碌准备了一下午,晚上赶到界湖,到了一个地方,被安排在一个大屋里住下等候出发。但大家谁也不睡着,在想象着去前线慰问演出的情景,想象里充满着神秘色彩。但清早又通知不去了,大家无不感到遗憾。后来得知去的有莒南的东良店剧团,他们有4个12岁的小姑娘,把花棍打到临沂。多年后,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没去临沂。我们团是两个姑娘打花棍,一个13岁,一个16岁,自然不如那4个12岁的精彩。这四个之中,有一个就是当今80多岁的老伴儿。

1947年春节,恰在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的中间,庆胜利和迎胜利,参军、参战,大支前的战斗气氛也充溢到各种文艺节目的演出中。我们以《参军保地去》高跷剧为主的演出,演了沂河两岸十余个村庄,到界湖镇年集参加演出比赛,又扛来红色锦旗一面。另一方面,是绿色锦旗,为南寨剧团得去。这场比赛,南寨的《为谁出伏》受到好评。

这一年冬春,工作十分繁忙。土改,我参加丈量土地;支前,我是支前委员会的成员;这一段时间里,和部队来往很多,有一晚上,剧团排戏,秩序总不好,灯被人弄翻,洒了我一身油,正在这时,部队的同志刚喊了一声“团长小同志”,我竟呜呜地哭了起来,这是真叫困难“困”住了。这是我一件难忘的丢丑的事。

剧团在移风易俗,树立社会新风气方面,也起了很大作用。村上举行新式结婚的,我们去扭秧歌祝贺。有一次,埠子顶的一个脱产干部回家结婚,请我们剧团去帮助喜事新办,我们为几个扭秧歌,奏各种欢快的乐曲,和村上乡亲一起,簇拥着新郎走上村头,迎接坐着小车的来的新娘。喜事办得没有一点耗费,又十分热闹,村干部们十分高兴,用猪肉、大白馍款待了我们,留我们晚上又演了戏。

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沂蒙山,我们村一带受摧残很严重。剧团的幕布丢失了。锣鼓埋在沙滩里一直没有找到,一些剧本也藏丢了,人员也减少一些,有的参军走了,有的在反蒋保田的斗争中牺牲了。胜利后,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,很快又把剧团恢复起来,大家十分热心,一齐献计献策,对有顾虑不愿再参加剧团的,分头登门动员;演出难借衣服,把自己的拿出来,没有锣鼓、幕布,跑外村借,过去许多演主角的不在了,老领导们不在了,我们这些当年的孩子已成了青年,应当全担起来。为了配合恢复生产,我们排演了小调剧《一条裤子》《翻身谈生产》和《砸了缸》。为了支援部队南下,重排了1946年的秧歌剧《支援前线》,只是角色大都不是原来的了。

我们演的这些戏,作者主要是:李林(《抗属真光荣》《双喜临门》《谁养活了谁》的作者,也是《沂蒙山小调》的整理者)、王汝俊(《送郎参军》的作者),还有艾芬,即贾霁。此外,还有《亲家母顶嘴》的作者丁铁铸,即丁志刚。

那些演员后来的情况是:邱为铎,全国水利专家,发明滴灌法;邱鹤亭,省内燃机研究所所长;潘效成,前卫文工团演出队长;邱增寿,县教育局,县里曾有歌谣,“谁家孩子要上学,去找增寿没有错”;邱奎亭,在国民党包围时,突围牺牲。

战争时期的农村剧团,是人民革命斗争广泛深入发展所产生的,它反映着人民革命斗争的生活,又是人民革命斗争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。逢年过节时的解放区文娱生活,是伴随着劳动人民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翻身所出现的,是革命历史的某一阶段所特有的现象。

行走

年龄越大,我越喜欢旅行。在旅行中会越来越惊奇地发现:自己原来有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念头,这些念头是日常生活中绝不会有的。比如生为呼伦贝尔的小草会怎样,在东海里成为一条鱼又如何……

来到了千岛湖之后,一种念头便油然而生:想在这里,做一棵树。或者,就做一棵山上的树吧。

千岛湖的山不高大,不雄奇,不陡峭,却也不庸常。之所以不庸常,大概全都倚仗了这些树吧。一棵一棵的树,一坡一坡的树,一山一山的树,这些树,让这些山像油画一样,是活泼泼的油画,是正在生长的油画,是不停变幻的油画,是谁的一双大手在没日没夜地痴迷地创作了一幅又一幅油画。

这些油画,一眼望过去全都是绿,一大团一大团的绿,一大堆一大堆的绿。可是仔细看,这一块绿和那一块绿都不一样,有的绿是浅浅的,如十一二岁的少女,是竹林吧?有的绿是深深的,如老成持重的长者,是松柏吧?有的绿很明媚,如刚谈恋爱的小姑娘,是很香吧?有的绿很清新,如刚刚毕业的学生,是水杉吧?一道云缠绵绵地绕过来,让这些个汁液丰沛的绿又变得羞涩起来,神秘起来,内敛起来,既像什么,又不像什么。

也许,说到底,它们像的,只是自己,不是吗?即使是同一块绿,也有着无数个影像。它们清晨时一个样儿,黄昏时又一个样儿,有风时一个样儿,有雨时又一个样儿。等到春夏秋冬时节更迭时,不用说,它们肯定是一个样儿又一个样儿。

满山的绿中,我默默地走着,忽然遥遥地看见一个人在一棵树下坐着。他坐得那么久,看得那么远,不知道在看什么。我便也坐在另一棵树下,也想让自己看得很远,可无论看得多远,视线所及之处,依然是满山的树。“玉川浮出碧山头,烟树重重翠欲流”,就是如此吧。

看着看着,我就觉得自己也成了棵树。

或者,就做一棵岛上的树吧。

岛都是小小的山,被偌大的湖面映衬着,便更显得是小小的了。小小的,很玲珑,却不会担心被忽略和被淹没,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即是耀眼和悦目的。如果说千岛湖是一件衣裳,一件巨大的衣裳,一件碧绿色的丝绸质地的素净衣裳,那么,这一个个的小岛就是衣裳上的翡翠扣子吧,这些翡翠的品阶还都是高翠。这些高翠扣子没有抛光,所以它的翠色还有点儿涩感,让人的目光落在上面不容易打滑,而一旦落上去呢,也会被粘得牢牢实实,不容易离开,也舍不得离开。

那就这样的岛上做一棵树吧,低处也好,可以叶叶安恬;高处也好,可以月照疏枝;傍花也好,可以蜂蝶拂香;临路也好,可以听闹市声;岛顶也好,可以与调皮的猴子们相伴嬉戏;若是湖边自然也好,可以于晨昏之时饱览沙鸥翔集……

微雨中,我行在龙山岛。从海公祠出来,便见左侧的台阶下,有一家卖烤鱼的小店,小店门口,长着一棵硕大的白蜡,正值花期,碎花满树,累累垂垂。走近细赏,觉得它们有点儿像桂花,却又比桂花璀璨,简直像阳光雕成的一样。伞碰到了它们,它们便落了一伞。人碰到了它们,它们便落人一身。这仿佛是在问候的笑容,又仿佛是亲密的低语:你好吗?你好啊。

这可爱的小模样,着实有些招惹惹人。这风雨的天气,也招惹了风雨。动了心的风雨一会儿便会碰它们一碰,它们便娇娇弱弱地落了一地。可是这情形却并不让人忧伤,仿佛它们是在用花朵来绣这个世界,落到哪里便绣到了哪里,哪里都是它们绣出的锦缎。

在这样的岛上,做一棵这样的树,也是好的吧?还一定不会失眠,每天晚上都一定能睡得酣酣甜甜。睡在这一粒高翠的翡翠上,每一个梦都会闪闪发光吧。

或者,就在许源村、江村、乌龙村、外朱村、楼底村中的一个做一棵茶树吧。惊蛰时分,春耕催芽。清明前后,采茶上山。立夏将至,治虫追肥。中秋月圆,秋茶待采。重阳整枝,入冬培土……我的世界条条密密,越野横岗。总有人为我为我辛勤忙碌。我要做的,就是和我的伙伴们一起迎着山风,浴着晨露,轻摇曼舞,聊天生长。一天又一天,一月又一月,一季又一季,一年又一年,满山的茶树都是相熟相亲,简直就像一家人一样——不,应当说,简直就是一家树一样。

“潇洒庐卢郡,春山半是茶,轻雷何好事,惊起雨前芽。”这是范仲淹为茶树写下的诗句。还有唐代的诗僧释灵一也曾缓缓吟出:“野泉烟火白云间,坐饮香茶爱此山。岩下维舟不忍去,清溪流水暮潺潺。”

千年之后,他们的诗句依然在我的白毫里活着,我的气息也依然在他们的诗句里活着。

或者,干脆随便做一棵什么树吧,随便做一棵什么树都好:在芦川村做一棵树皮斑驳的榿树,在笔架尖做一棵幼枝紫绿的兰果,在桐子坞做一棵芬芳四溢的香樟……

当然,也是随便长在什么地方都好,哪怕是“芳草西郊外,疏篱野老家”。

只要是在千岛湖,就好。

为什么总想做一棵树呢?我问自己。

想了想,便自问自答:因为知道树往往比人活得久,活得静,活得深,活得更美。尤其是在千岛湖这样好山好水的地方。贪婪的我,就想做一棵树,不动,不走,就在这么一个地方,一生一世。也许,上辈子的我,就是这里的一棵茶树。

在千岛湖,做一棵树

口乔叶

千岛湖 记录